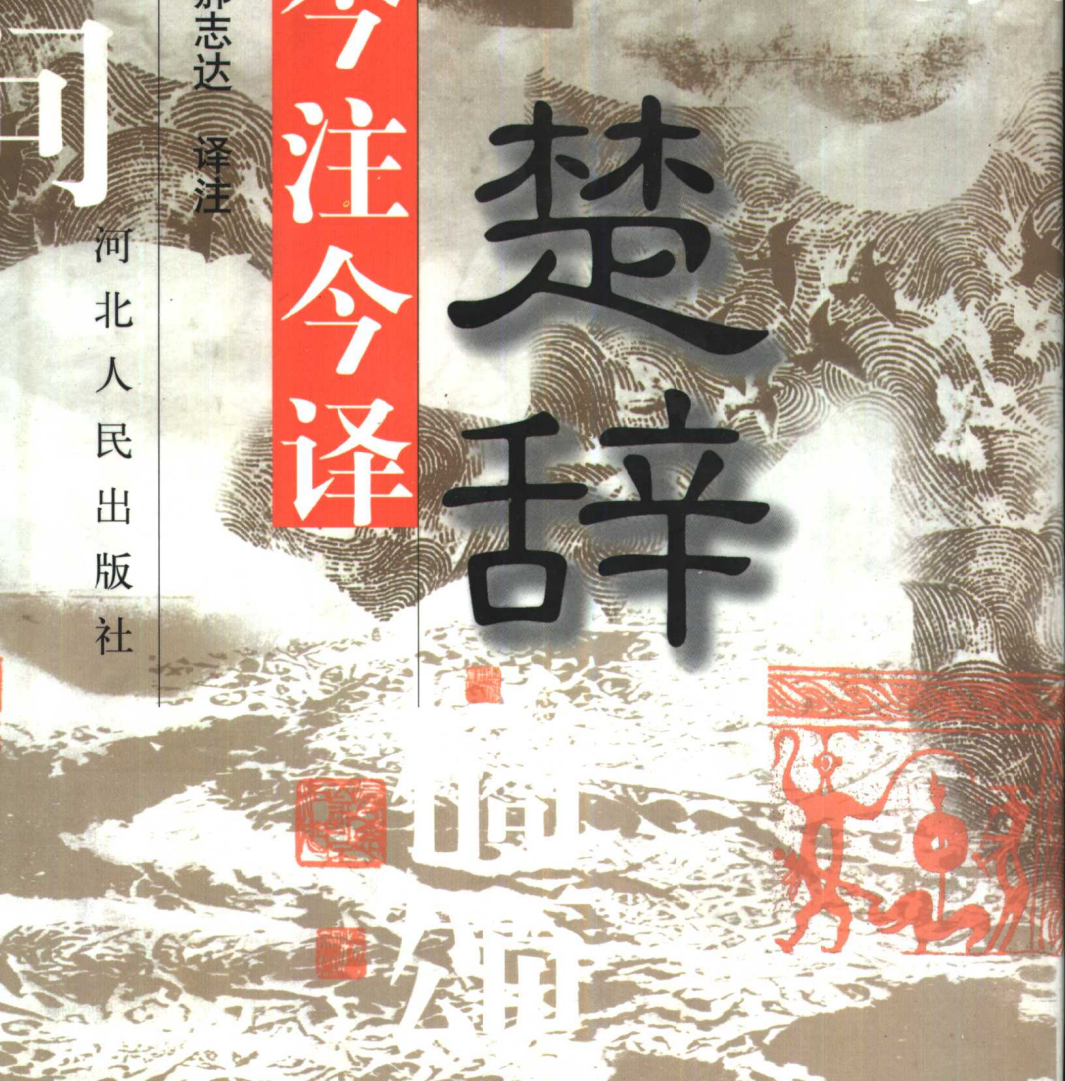


楚辞卷一
离骚
屈原



楚辞

今注今译

郝志达 译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

郝志达 译注

楚辭今注今譯



蘇洵仁悅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社

[Faint background text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今注今译/ (宋) 朱熹著; 郝志达译注.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1

ISBN 7-202-02527-2

I. 楚… II. ①朱… ②郝… III. ①楚辞-注释②楚辞-译文 IV. I22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384 号

书 名 楚辞今注今译

作 者 郝志达 译注

责任编辑 张 琦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装帧设计 宋丕胜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875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202-02527-2/I·541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所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学体式。

《楚辞》又是一部诗集。它是指西汉时期刘向将屈原和屈原以后的楚国作家宋玉等人，以及西汉时期模拟屈骚的辞赋，编辑成一集共十六卷，题名“楚辞”，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家文学总集。

可见，伟大诗人屈原和楚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屈原悲剧一生对历史的强大震撼，屈原所创造的光辉的艺术成就，都在楚辞这种艺术形式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实在不可缺少《楚辞》这一重要文本。

—

在中国诗歌史上，《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的又一朵艳丽的奇葩；《诗》、《骚》并称，它

们代表着先秦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那么，《楚辞》这一新的文学体式是如何形成的呢？

《隋书·经籍志》说：“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痛惜其师，伤而和之，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这说明了屈原和这种新诗体的关系，并没有涉及到楚辞这种新文体的产生和特点。今人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有一段重要论述：“楚辞，特别是屈原的作品，都是经意的创造。除掉《天问》一篇还多少遵守着四言的格调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部打破了。……屈原之所以成就了这项工程的重要原因，我看就是因为它利用了自成天籁的歌谣体。他是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来把台阁体的四言格调打破了。屈原可以毫不夸张的给他一个尊号，是最伟大的一位白话诗人。”在这里，郭沫若特别强调了诗人“经意”的创造，强调了“自成天籁的歌谣体”。所以，我们可以说，所谓楚辞新诗体，就是在战国中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在吸收民间歌谣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新的诗歌形式。

这种新的诗歌形式，有其借鉴、演变、创造并融为一体的发展过程。首先，《诗经》的四言形式和现实主义传统，在楚辞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诗经》“二南”中江南一带的民歌，不仅保存着楚地的民俗特色，也是早于楚辞的楚地民歌，这对楚辞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其次，先秦、两汉古籍中保存的、至今尚能看到的江汉民歌、民谣，即所谓“南音”，是我们探讨楚辞源流的重要材料。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下）说：“《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最工者，推屈原、宋玉。”《凤兮》一歌，最早见于《论语·微子》篇，据《史记》载，孔子适楚（在鲁哀公六年，即公元前489年）听到此歌，也就是说《凤兮》一歌至少流传于公元前489年以前，这首地道的楚歌是公元前五世纪楚地的

民歌。《沧浪歌》又称《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首歌最早见于《孟子·离娄》篇，《楚辞·渔父》中有相同的记载，这首歌也是楚声，大概也是公元前5—4世纪的作品。从这两首民歌看，明显地表现出不分章、不拘体格、同时具有散体化的特色。而这些恰恰被屈原早期的创作，如《橘颂》一类作品所继承。从古籍保存下来的，可以认定为楚诗的还有两首诗很重要，即《越人歌》和《徐人歌》。《越人歌》见于《说苑·善说》篇。这首诗是说在楚康王时（公元前559年），鄂君子皙泛舟河中，掌船的越人用越语唱了一首歌，鄂君听不懂，于是请人用楚语译出，这译诗很有楚诗的味道：“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谗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歌词清新优美，呈现出楚地情歌缠绵婉转的特色。特别后两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它不仅包含了生动感人的比喻手法，而且与《九歌》的主体句式完全相同。另一首《徐人歌》，最早见于《新序·节士》篇。它是记载春秋末年徐人赞扬延陵季子（吴公子季札）守信的一首诗。这首诗与《越人歌》的句式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把历史推移到汉代初年的楚汉之争，项羽被围垓下，“夜闻汉军皆楚歌”，盖世英雄项羽，穷途末路，唱出那首悲歌慷慨“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垓下歌》，使我们更加明了楚歌的特有形式，一直到汉代初年依然很流行。可以说，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是楚歌在汉代的复活。这里，我们只是着重从诗歌形式上来看楚歌对楚辞形成的影响。如果从曲调和音乐上来观照，楚辞就更具鲜明的地方特色。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中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黄氏准确地从形式上概括了楚辞的一些特点，其中，运用“楚声”，可

以说是屈原作品的一个特殊标志。后来《楚辞》的编者把一些非楚人之作也编进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楚声为依据的。所谓“楚声”，即以特有的声调诵读。以楚声诵读楚辞，是一种专长。《汉书·朱买臣传》载：“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所谓“言”，就包括诵读声调。后来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汉书·王褒传》更明确记载：“宣帝时，修武帝故事……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直到唐代，还保存有用“楚声”来读楚辞的，到宋代失传。

第三，楚地民俗中的巫风对楚辞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总叙》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亦云：“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楚地这种风习，直接继承着商代宗教观念和原始宗教巫风的习俗。“以舞降神，为人祈祷”乃是巫风最本质的特征。屈原所创作的《九歌》、《招魂》等，虽经过诗人的加工和再创造，但其中留存了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的神话传说，极富故事性。而这正是屈原创作植根的土地。

第四，与屈原同时代的散体赋的雏形，对楚辞的创作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与屈原同时的荀卿，用散韵相间的形式写了五篇赋和一篇《成相辞》。荀卿赋表面上咏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含有作者情感，实际上的内容还是说理。但是，赋这种“体物写志”，敷衍成为长篇的特点，对楚辞这种新诗体，不能不说有很大影响。

总之，伟大诗人屈原，他植根于时代的环境和特殊的土壤之中，依靠他特有的教养和天才，继承楚文化传统，创造出想象丰富、热烈奔放、具有浓厚宗教情调和浓烈乡土气息的抒情诗

篇——这就是楚辞的诞生。

楚辞的产生，标志着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了真正的诗人个性诗歌的创作。如果说《诗经》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那么，楚辞就是作家天才的创造。

二

屈原是楚辞的缔造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

关于屈原生平的最早史料，要算西汉时期的贾谊所写的《吊屈原赋》，赋中第一次提到屈原的名字；不过，这是在屈原死后一百多年。后来司马迁为屈原写了一篇传记，即《史记·屈原列传》。但这篇传记比较简约，造成后人许许多多的争议；不过，这篇传记毕竟是考察屈原生平最重要的史料。因此，了解屈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他留给后世的文本，参照其他史料，使我们能对诗人屈原有一个近真的把握。

屈原（前 340?—前 278?），名平，字原，楚国贵族出身，与楚王同姓；生当楚宣王、威王、怀王、顷襄王之世，主要是怀、襄二世。屈原生活的时代恰在战国中后期，整个中国正面临着由分裂向大一统转化的历史时期。在战国“七雄”中，西方后起之秀秦国，南方幅员广阔、物产丰富的楚国，东方文化发达的齐国最为强盛，因此，谁能最终夺得统一大业，势必取决于这些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成熟条件。

屈原生在楚国。从楚国的历史观之，当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史记·楚世家》）开始，就不断扩大地盘，到春秋时代，在政治、军事上都有长足进展。到楚庄王（前 613—前 590）时成了春秋五霸之一。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楚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又有了相当高的发展，楚国就是最早使用铁器

的。尤其到楚悼王（前 401—前 381），起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吴起列传》），致使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成为当时最强盛的诸侯国。但吴起变法，在楚国时间很短，《韩非子·和氏》篇说：“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楚国的吴起变法失败了，但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却获得成功，正如《韩非子》所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鞅而富强。”楚悼王死于公元前 381 年，距离屈原出生仅 40 年左右。吴起变法在楚国失败后，统治阶级内部一直争斗十分激烈，待到楚怀王时，政局日益腐败，屈原的一生恰恰主要就生活在这一时期。

屈原虽出身贵族，却是一位有学识、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列传》），具有出众的才能，广博的知识，清醒的政治头脑，从青年时代就养成了刚直不阿的可贵品质，热爱祖国，并立志从事一番大事业。他在年轻时，写了一篇寓意深刻的诗篇《橘颂》。在这篇咏物抒情之作中，他赞叹橘树的“有以异兮”与众不同的“幼志”，歌颂它“独立不迁”的坚定不变的品格，突出它“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生活准则，借颂橘，活现出诗人自身的人生追求和人格美。屈原在 20 岁左右，登上政治舞台，深得楚怀王信任，出任左徒官职，《史记·屈原列传》载：“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可见当初他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希求力挽狂澜的政治家。从有关史料和他的作品线索，知道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变法图强，《九章·惜往日》中有：“昔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这里表现出屈原受重用时的作为，同时也可看出他对楚国富强的热情期望。《史记·屈原列传》还载有“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应该说是指制订改革时

政的宪法一类。所以，上官夺稿一事，就不仅仅是“心害其能”，应该说，上官大夫在楚怀王面前谗害屈原，有着更深刻的反对变法的政治背景。另一件大事，就是屈原力主“联齐抗秦”，实行“合纵”策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楚国贵族保守势力非常强大，屈原的这些主张，必然触犯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就形成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力图变法图强、联齐抗秦的改革派，和以上官大夫为代表的亲秦投降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楚怀王左右摇摆，再加之以秦国又派张仪来楚，疏通郑袖，楚怀王听信谗言，最后解除了屈原的左徒官职。屈原被疏远，被排挤出楚国的政治舞台。

屈原在政治上受到如此沉重打击，倒使他更加看清楚国政局的腐败，看清了朝廷当政的“党人”苟且偷安，“竞进贪婪”的嘴脸，内心产生对祸国殃民的党人的无比憎恨，对楚怀王也是“怨其不争”。但此时屈原在政治上仍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并把希望寄托在楚王的幡然悔悟上。这一时期，屈原心中悲痛、愤怒、惋惜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在他的诗作，如《九章》中的《惜诵》、《抽思》、《思美人》等，都有真切的表现。《惜诵》中的“**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呼号又莫吾闻**”，把诗人那种进不得、退不愿的悲愤心境展示出来。《抽思》中更活现出屈原那颗关心国事，热爱国家的赤子之心：“**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后来，楚怀王被秦国所骗，死在秦国，顷襄王立。襄王更加昏庸，经不起秦国的恫吓和国内投降派的包围，很快屈服于秦。屈原此时已不在位，他看到这一切，心情十分悲痛。诗人用他的笔，写下不少诗篇，抒发他的情怀。伟大的长篇叙事抒情诗《离骚》，经过长期酝酿，在这一时期问世。与此同时，屈原又借楚地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创作了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诗篇《招魂》。

实际上,《招魂》是一篇“借题寄兴”之作,诗中表明的是“怀王为秦所虏,魂亡魄失,屈子恋君而招之”(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的主旨,同时又倾吐了诗人对故国的热恋,对岌岌可危的国家命运的关注。顷襄王当政后,上官大夫、令尹子兰等又在顷襄王面前进谗,很快就流放屈原于江南之野。诗人在流放过程中,不仅生活十分艰苦,心灵也要忍受巨大的创痛,《渔父》中载:“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可以说,就是这种活生生的现实,把原本的一个政治家造就成一位“悲愤诗人”。《九章》中的《涉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在这里,既写出诗人流放生活的艰难,更写出诗人决不与恶势力妥协的决心。屈原长期被流放,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民间,并得以借鉴民间喜闻乐见的祭歌形式,创作了一组优美的神话抒情诗《九歌》。同样,历来被称之为奇文的《天问》,大概也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天问》通篇发问,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发问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表明了屈原的宇宙观、自然观和他探求真理的精神。待到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攻下西陵,掘了楚王的坟墓,二十一年,攻下郢都,襄王迁都陈城(今河南淮阳)。在此之前,屈原可能又一次回到郢都,想争取最后的机会劝谏襄王,但又失败了。这时,屈原和郢都的百姓、平民一起向东逃难,诗人看到楚国即将覆灭的悲惨结局,对楚王的悔悟也信心殆尽,写下了震撼人心的诗篇《哀郢》,一再倾诉忠于故国、热爱故土的赤子的一片忠诚。就在这一年,当他写完《怀沙》这篇绝命辞,走到长沙附近的汨罗河畔,怀抱着悲愤与绝望,投江自杀。

可以说，屈原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篇章，是在诗人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完成的。《远游》，这“忧患现实的悲愤诗”，不仅尽情发挥了诗人的“出世之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表述了他独特的生命意识。《九章》中的《惜往日》、《悲回风》亦可视为“临绝之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悲回风》，这首诗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中闪烁着个性光辉的最早的悲秋之作。诗中所写不是一时一地的感慨，而是诗人对整个人生、宇宙的深刻理解。《悲回风》是屈原于“行吟泽畔”的放逐中，临死前不久的一个深秋，写下的一篇震撼人心的纯为泣诉、确乎诗境的抒情诗。

屈原不仅是楚辞的创造者，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用整个生命献身于诗歌艺术，用他的全部精神和情感吟唱了那一个悲剧时代。

三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深刻的悲剧人物。他的一生都以复兴楚国的政治活动为己任，并以存君兴国为终生奋斗目标，其开始无疑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但是，屈原的道德理想太高，与现实的矛盾差距太大，使他陷入一种痛苦的孤独心境。屈原的创作，充分反映了这种复杂的矛盾。正如梁启超在他的《屈原研究》中所说：“屈原本身有两种矛盾性，”“他在作品中把这两种矛盾性充分发挥，有一半是哭诉人生的冤苦，有一半是寻求他理想的天国。”

通观诗人的创作，所谓“理想的天国”，简言之，就是指对“美政”的追寻。而“美政”思想乃是他情感抒发和哲理思辨的核心。《离骚》结尾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作品中“美政”情感

的抒发，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晰，再现了诗人理想政治无法实现的痛心与悲愤，表达出诗人丧失精神支柱、痛不欲生的灵魂呐喊！

在屈原“美政”的追求中，他并没有脱离儒家的理想政治。翻检屈原之作，诗人从不同视角提到众多古之圣君：尧、舜、禹、汤、文武、楚之三后，以及齐桓、晋文等等，但应该明确，请出亡灵旨在评说现实政治，绝非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屈原对现世楚君的品评与抨击，是在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中，以自身确认的明君尺度无情地衡量现世君主，又包含了以一己之情感塑造现世君主的强烈愿望。《离骚》中所表述的诗人心声：“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这里显然迸发着哲人式的理性思索光芒。诗人屈原是以自己的理想，即理性标准对国君提出要求，毫不动摇，绝不让步，可以说，这是屈子“美政”追求的特质，也正是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屈原，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无法合作的焦点。这确实是个悲剧，但这悲剧的深刻性倒玉成了屈原，使他成为了伟大的民族诗人。

我们认为，作为诗人，屈原在他的作品中蕴涵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了诗人的主体精神。通观屈子一生创作，可以看出“以道自任”、“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是他人生的立足点。他的忧患意识、斗争意识、人格完善意识在其作品中多方面的形象展示，清晰地再现了一部作家的灵魂发展史。它的重要特色又在于不是“肤浅的外在冲突掩盖人物深邃的灵魂搏斗”，它可以使读者领悟到诗人心灵历程的终极，也会使读者洞察时代深沉的历史性悲剧。

屈原的“忧患意识”，不是“由自我走向自我”的忧患，而是“由自我走向社会”的忧患，是作家肩负起时代使命感的一种生命之流的冲动。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精辟地披露

了诗人怨情迸发的外在世界的依据：“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显然，在这里，司马迁认为，屈原的作品饱含着对外在黑暗世界的否定与批判，其主流绝非是“怀才不遇”的自我悲哀。从诗人一生的经历和全部创作观之，屈原的视野逐渐从朝廷的罗网冲向整个社会：他心灵深处的悲痛呻吟，由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为契机，迸发出对“党人”的深刻揭露、对君王的怨恨和对国家前途忧虑关怀的恨与爱的强烈情感。这是诗人站在时代哲人的至高点，通过自身的不幸遭遇，倾诉着、哭喊着光明被吞噬、真善美被扼杀的悲惨世界。这种情感是与时代、人世间的痛苦息息相通，体现出进取与批判的时代精神的。不可否认，在屈原的作品中，几乎无处不流露出诗人那种想“帮忙而不得”的不平，他很希望君王是一位“举贤授能”，励精图治，雄才大略的“哲王”、“明君”，以便实现自己的美政。这种只认识“在上的力量”的心态，不仅是屈原的悲哀，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先天不足和不幸。可贵的是，诗人能够立足现实，敢于对现实作无情的解剖，充满变革现实的激情，这是作家主体精神“内美”追求在与现实的撞击中，表现出来的最深沉的忧患意识的情结，它构成了屈原诗歌震撼人心的主旋律。

屈原创作中的斗争意识，是体现诗人创作个性的最强音。《离骚》所表现的“体解吾犹未变”、“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世界，应该视为作家改造现实、创构未来的一种顽强的情感冲力。

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出，屈原作品中的斗争意识，并非仅仅指向社会道德层次和政治层次压抑的肤浅批判，而是在灵魂的自我解剖中，展现出诗人深邃的感受和对人生道路的痛苦抉择。这种体认，来自对《离骚》、《九章》等诗篇的理解。《离骚》中五个

“将”字的层次（“愿埃时乎吾将刈”、“延伫乎吾将反”、“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将远逝以自疏”、“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清晰地展示出诗人理想追求的痛苦心灵历程。而“吾将上下而求索”乃是屈原与现实搏击的精神支柱。《九章·惜诵》中说：“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九折臂而成医兮，吾今而知其信然。”这样的诗句确实写出的是一个辅佐君主的忠臣遭到主子不信任后的灵魂自白；《九章·抽思》中还说：“何独乐斯之晷晷兮，愿荪美之可完。”《离骚》中更有“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诗人这种寄希望于君主又怨其不争的情感抒发，在作品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果作品仅仅表现于此，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忠臣而已，他的悲哀也只不过是“失去自觉服从机会的悲哀”。然而，屈原创作的价值所在，恰恰在这一点上突破了时代的局限，冲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忠臣形象。这种“冲破”，主要表现在诗人对恶势力否定、批判的同时，鲜明地展示出灵魂搏击中**对美的韧性的强烈追求**；在揭露与抨击黑暗现实中，始终恪守信念与理想，不存在丝毫妥协与迁就。这种韧性的强烈追求，使诗人的情感抒发“是烦闷的却又是浓挚的、孤清的、坚强的”，“全含抗奋性，看不出一点消极的痕迹”。屈原抒情诗的“孤清”、“坚强”的性格塑造，所以能启迪和打动读者的心灵，就在于诗人在无情的自我解剖中，选择意识的深刻揭示。《离骚》中的“上下求索”、“三次求女”、“去与留”的浪漫主义描写正是这种选择意识感人肺腑的倾吐；在《九章》中诸如：“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思美人》）“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涉江》）“登高吾不说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这无法遏止的灵魂迸发，是诗人对现实世界美与丑的对比

中的自我认知，自我抉择，是诗人斗争意识的形象吐露。总之，诗人那种“深固难徙”、“独立不迁”的性格，“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的美好持守，成为一条红线，贯穿屈子创作的始终。

屈原创作中的人格完善意识，就是指对“自我修洁”的持守。这是诗人手中“锐利”的武器。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论述《离骚》时说：“以好修为纲领，以从彭咸之所居为结穴，”准确地点透了屈原创作中“好修”的精神实质。诗人对这种美的追求，恰恰是和诗人对丑的批判同时存在，“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离骚》），可见屈原美的追求乃是现实世界中丑恶的对立物，是对现实世界“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刻体认，诗文中表层上所展示出的“孤芳自赏”、“露才扬己”，正是诗人深层意识，即主体精神世界中那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坚定信念的形象再现。

人格完善意识在屈原的创作中，作为诗人心灵的解析，其复杂性还在于：作为斗争意识的延伸，它始终激荡着高亢的情调，显示了时代的理性、批判与进取的力量；然而，诗人面对强大的恶势力深感美政无法实现，又与时俗绝不妥协，时而陷入一种“自我完善”、逃离现实的苦痛挣扎之中，《九章·悲回风》中“存仿佛而不见兮，心涌跃其若汤”正是这种复杂心绪的集中体现。《离骚》、《九章》诸篇中，反复倾诉“好修以为常”的持守，不可否认，具有表现与剖白诗人不与世同流合污的“清白的灵魂”的一面，也正如《渔父》所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屈原为什么写出《远游》那样的作品了。《远游》篇的艺术价值，正在于它把诗人的人格完善意识中的两种矛盾，淋漓尽

致地做了尽情的发挥；《远游》是诗人恪守人格完善、抗争恶势力的精神武器。

说到底，在屈原的诗歌创作中，回环反复迸发出来的忧患意识、斗争意识、人格完善意识，就是欲以自身的“内美”追求，去匡救和改造那“污浊”的大千世界；最终落实到时政上即“美政”的实现。屈原作为政治家和诗人，“头脑很冷”“心肠很热”，具有为楚国君主设计与建构改变现状通向未来的方案的强烈意向。从他诗歌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思索，应该说与先秦哲人“以道自任”、“以道辅势”，大任降于己的理性认知，别无二致。然屈原的悲剧恰恰在于：他一腔热血的“美政”追求，既得不到专制制度下君主独裁的认可，而诗人用全部热情所追求和讴歌的“理想天国”又何尝不是对君主专制的完善？从此视角来看，屈原的悲剧也正是时代的悲剧。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多少头脑清醒、富于正义感、有作为的“士人”，出于他们对专制统治的不满，或规劝陈辞，或慨叹忧愤，到头来只能像鲁迅先生深刻指出的那样，不过是一种“不得帮忙的不平”。这种传统的重压，酿成了无数志士仁人的悲剧结局，屈原也摆脱不掉这一必然命运。不看清此点就没有了历史主义，但是，屈原悲剧的特性更在于它突破了“不得帮忙的不平”的哀怨。审视屈原的全部作品，他的自我意识的情感抒发，无疑正如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一文中所说：“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先天的屈原不是一个奴隶，后天的屈原也不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之不能完全不是奴隶，我们应该同情（那是时代束缚了他）；他之能不完全是一个奴隶，我们尤其应该钦佩。”这真是精彩的历史主义分析。正因为屈原“不完全是一个奴隶”，品性的“孤高与激烈”，使诗人在其作品中，无情暴露与鞭挞统治者的罪行，又表现着诗人在时代理性思维大潮冲击